

马援与朱勃



一个人。他的名字叫:朱勃。

马援(前14年-49年),字文渊,东汉右扶风茂陵人。著名军事家,东汉开国功臣之一。新朝末年,天下大乱。马援初为陇右军阀隗嚣属下,甚得隗嚣的信任,后来归顺光武帝刘秀。东汉初年,他帮助光武帝决策陇蜀,西破诸羌,南征交趾,北遏乌桓,官至“伏波将军”,受封“新息侯”。最后,他以62岁的高龄主动请缨,南征武陵五溪蛮,因病交瘁,加之军中流言蜚语,猝死于壶头山(今湖南沅陵县)。

在马援南征武陵的副将名单中,有马武和耿舒等人,他们都是光武帝嫡系代表人物。马援和他们素非同路之人,关系似乎一直不大和睦。在进军路线的选择上,马援和其部将发生分歧。当军队来到下隰(今湖南沅陵县东北)时,有两条路可供选择:一是由壶头(今沅陵县北)进军,路途较近,但水势颇为险恶;另一条则为由充(今湖南常德市境内)进军,此路较平,但路线较长。马援主张由第一条路线进军,而耿舒则主张第二条。事闻于光武帝,刘秀同意马援之策。但因水势的险要和气候的炎热,汉军遭受挫折,许多士兵病死,马援自己也身染重病。

于是,本来就与马援意见不和的耿舒十分不满,写信给自己的兄长——建威大将军、好时候耿种,大发牢骚,且暗示马援有拥兵自重、专横独裁、吃喝嫖赌之嫌。耿种读罢之后,非常气愤,便将那封家书上呈光武帝。于是,刘秀便委派他的女婿、虎贲中郎将梁松去责问马援。可是,当梁松抵达五溪蛮前线时,马援已经病死了。随即,因为些许小事一直对马援怀恨在心的梁松趁此机会极尽诬陷、栽赃、诬害之能事,先回消息说马援畏罪羞愧自杀,接着上书说当年马援南征交趾,班师回朝时装载了一车的明珠犀角,另外附加了马武与侯景的证言。此事一经播出,举朝哗然,朝中官吏纷纷上表,例证确有此事。这番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诘,终于使刘秀动了雷霆之怒,于是下诏收回了马援新息侯印绶,并令其棺柩不得回葬祖坟。

其实,马援进军壶头山,不过是失策而已,并未打什么败仗,没有多大的罪过,却受到如此严重的处罚,实在是太过冤枉!可怜这位名将一生戎马倥偬,功勋卓著,为东汉王朝的建立与巩固立下了汗马功劳,死后竟落得如此下场,尸骨不仅难以栖身故园,而且还搞得身败名裂,实在令人唏嘘……

马援最终能得以归葬祖坟,这个要感谢

介意,反而愈发谦恭,视马援如兄长……

马援死后,尸体从武陵运回洛阳,他的妻子儿女过去收尸,惊骇万状,不敢将棺柩运回扶风祖墓,只好在城西随便买了几亩薄田,草草下葬了。马援昔日门下的那些宾客旧友,没有人敢前来祭吊,更没有人敢为他说话。

无奈,马援的侄儿马严用草绳缠成锁链,将自己和马援的妻子、马援的四个儿子、三个未出嫁的小女儿一并捆系在一起,跪在宫阙口请罪。宫阙口乃百官上朝等候列队的必经之路。那时,正值盛夏酷暑,他们盯着大太阳跪了大半天,刘秀才让人把梁松的那篇奏章拿给他们看,方才得知马援被诬陷蒙冤。这一切都是子虚乌有,望风捕影!于是,他们回家后连忙上书鸣冤,前后共达六次,情辞十分哀伤悲切。但是,刘秀都置之不理。

锦上添花容易,雪中送炭才难。在马援吃香的时候,拍马屁的人比比皆是;但马援蒙冤后,谁愿意冒着跟当红权贵作对的风险替马援仗义执言呢?马援的昔日同僚都在一旁看热闹,没人敢站出来说一句公道话。

有一个人,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挺身而出……

一

年已六旬的前任云阳县令朱勃风尘仆仆地赶到了洛阳,他不怕冒死,与马氏家族的人一起跪伏在皇阙口,并给光武帝上呈了一封《诣阙上书理马援》。

在这篇诣阙上讼冤书里,他对马援将军一生的功业进行了全面的述评。全文七百多字,文笔朴实无华、意蕴深厚、笔触沉痛,感人至深。这篇上书,可谓是朱勃以性命作赌,在为好友马援极力辩护。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为了故旧知交,其心之诚,绝不亚于当初礼震舍身为欧阳歙请命;其大义和勇气难能可贵,值得后人敬仰!

应该说,朱勃的那封上书还是起了点作用,刘秀读罢怒气稍有消解。同时,那封上书也使这档官司的疑点初露端倪,若真要深挖下去,势必会挖到一些不堪入目的东西;若马援真的无罪,那么查证说马援有罪的梁松则难逃罪咎……刘秀将那篇奏书反复看了好几遍,最后才恩准马家人将马援灵柩运回扶风老家安葬,也没有再继续追查马援之罪,也没有加封马援的四个儿子。

二

伏波将军马援的生平事迹见于《后汉书》等史志之中,可谓彪炳史册,名垂千古。而那位曾为他蒙冤而冒死上书的同乡朱勃呢?据说,当年他在呈上那封奏书后不久,便辞官归乡了。此后,就再无消息。

为了查找朱勃的资料,我翻阅了《后汉书》《东观汉记》《资治通鉴》《扶风县志》《淳化县志》《扶风县乡土志》《扶风人文典故》《天南地北扶风人》等大量史志文献,并在百度里搜索,但关于他的文字极少,也没有他为马援冒死上书之后的事情。

今年,绛帐老街“二月二”庙会的前一天,我回了一趟老家,在春光村王公端老师家见到了春光村人、老作家朱文科。朱老师告诉我,绛帐镇春光村朱家庄一带姓朱的基本上都是东汉初年云阳县令朱勃的后裔。接着,他给我大略讲述了一下朱家祖坟和朱家祠堂的事情,说是如今的春光小学所在地曾有一

座占地面积很大的朱家祠堂,北门楼外还有一座占地八亩的朱家祖坟,可惜后来皆毁于“文革”之中。

过去,在绛帐镇北门楼外的西北方向有一片用刺楸树枝围挡起来的占地约为八亩的坟地。这里西边、东北、东南三个方位地势较高,整体呈梅花状。坟地里长着数不清的柏树,中心有一座隆起地表的坟墓。墓前有一座高大的青石碑,碑楼的北边有一块长约1.5米、宽约1米的石案。石案北边1米外,栽着两根石旗杆,每根旗杆上分三层装了三个铁斗,每个铁斗上插着四面铁旗,每面铁旗上空空刻着篆体的“朱”字。在坟墓的东南角上还有两间小房,这是守墓人的居所。当年最后一个守陵人叫朱忙生,已经去世多年。据朱文科的族亲朱军成回忆,这座坟内原来有一把镇墓之宝——绿色剑鞘的流星宝剑,可惜后来被盗墓贼弄走了……

据朱老师回忆,朱家曾是绛帐镇东街一带的名门望族,家族祠堂门朝南开,临街有两扇高大气派的朱漆木门。祠堂门口蹲着两尊张牙舞爪、气势凶猛的高大石狮子。在两侧石狮子旁边也都分别各栽着一根石旗杆,不过它们较之坟地的石旗杆显得更加气派。庭院很大,栽了数十棵柏树。一排七间大房与大门相接。院内两侧还有五间鲜亮的厦房。举目望去,三间巧夺天工、精雕细刻的古式建构的大房座落在院子正上方,这正是每年正月初一祭祖的地方。朱老师还说,他10多岁时,曾亲眼见过朱家祠堂内的祖案前所挂的谱牒上有老先人三代亡灵正襟危坐、头戴官帽、身着官服的图像和裱有各自姓名的牌位。

但究其有无第二代先人——东汉初年云阳县令朱勃和汉皇帝赐封的丹阳太守朱柱,他已经毫无印象了。他曾听他的父亲、朱家祠堂主持人和己至人瑞之年的族人朱军成说过,朱家祖坟中的确埋着一个曾当过东汉云阳县令名叫朱勃的先人。当我希望他带我去看朱家祖坟时,他说那个东西现存于族亲朱增家的二楼上,他人平时不在家中,等有机会再说。

临走时,朱老师送我一本去年出版的个人文集。当天晚上返回西安后,我便急切地打开这本书,看到了关于朱家祖坟和朱家祠堂的文章,心里五味杂陈,时至半夜还迟迟不能入眠……

刘省平

人物春秋

西方艺术史中那一抹鲜艳的「红」

在古代,红色象征财富和地位,是古代贵族青睐的颜色。

古典时代和中世纪,欧洲工匠和商人们致力于寻找持久饱和的色彩。染工们则严格保守染色的秘密,他们用树根和树脂来制作令人满意的黄色、绿色和蓝色,从紫色海蜗牛体内提取为帝王制作衣服的紫色,但如何配制鲜艳的红色仍然是个不解之谜。

多年来,欧洲最常见的红来自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红”,它提取自茜草的根部。但欧洲染工们并不满足于“土耳其红”,不断进行新的试验。他们曾试图用牛粪、腐臭的橄榄油和公牛血的混合物来提取红色,也尝试过用巴西红木、紫胶虫和地衣作为提取物,但结果都不尽如人意。

16世纪以前,对于欧洲王室和贵族而言,获取红色的途径太少了,要么是一种叫“圣约翰草”的芳香植物,要么用亚美尼亚红,即一种用玄武土、赭石等矿物染料合成的红色。不管哪一种,制作过程都非常劳民伤财。

贵族们不断斥巨资以寻求更加鲜艳饱和的红色,直到西班牙殖民者在阿兹特克帝国的首都特诺奇蒂特兰城(即今日的墨西哥城)发现了那群人的胭脂虫红。

胭脂虫红是从雌性胭脂虫体内提取的一种天然色素,色调呈粉红至紫红,可以用来制造绯红色染料。据墨西哥染织专家分析,早在公元前2000年,墨西哥南部的中美洲人就开始使用胭脂虫提取红色用于染料。当地的土著居民拥有养殖胭脂虫的成熟技术,它们被广泛应用于制作染料、颜料,甚至是药物。

当西班牙殖民者抵达特诺奇蒂特兰城时,红色无处不在。偏远村庄的居民用胭脂虫和红布向统治者上贡。西班牙殖民者们很快意识到胭脂虫的财富价值。

果然,欧洲染工一接触到胭脂虫,就无比兴奋,因为胭脂虫红的染料效力是圣约翰草的10倍,一盆司的产量是亚美尼亚红的30倍。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们所见到的最耀眼、最完美的红色。16世纪中叶,胭脂虫红已经在欧洲广泛使用并成为最赚钱的商品之一,到1574年,胭脂虫红贸易额已经超过15万英镑。

鲁本斯的画作《伊莎贝拉·勃兰特》体现了胭脂虫红丰富的可塑性。伊莎贝拉身后的墙壁被描绘成深红色,端坐的伊莎贝拉仿佛置身于微弱的光环中,她手中的《圣经》更是呈现出胭脂虫红的精致细腻。在鲁本斯高超的画技下,画中的一切栩栩如生。

直到19世纪中叶,胭脂虫红才被合成染料替代,但印象派画家们仍然继续使用这种红。高更、雷诺阿和凡·高的画作经分析都曾运用过胭脂虫红。雷诺阿的肖像作品像鲁本斯的一般鲜活,但作为印象派画家,他的肖像画融入了抽象的笔触。而高更擅用颜色,尤其是用红色来突出画面中的重点。

谭静雪

视点



赵望云作品

20世纪40年代,贫苦无告而又热爱艺术的青年梁黄胄、方济众、徐庶之先后来到赵望云家学画,吃住在他家。

黄胄跟赵望云学画,是在1943年底由豫剧演员樊粹庭介绍的。赵望云见了黄胄和他的画,兴奋地对别人说:“今天遇到了一个小孩子画得非常好。我从不收学生,但是今天我收了他做学生。”

黄胄从小流落街头,17岁以后到赵望云家学画,吃住在他家。老师要求很严,教导他,生活、创作、技巧是统一体,艺术是从生活中来的,这是方向。老师的房子里挂了一幅张大千仿黄鹤山樵的山水画,题目是《空山无人,水流花开》。老师对传统笔墨是刻意追求的,这一点,对他很大教益。



“在生活中写生,从写生中塑造个人风格”,是赵先生传给黄胄的艺术理念。黄胄的画风,不管是他的人物画,还是他画驴、画马,其基本方法甚至基本的笔墨感觉,也都是从赵望云的人物写生、动物画法中提炼出来的。

黄胄在赵望云身边一直跟了5年多。老师很宠爱这个思维敏捷的学生,让他一个人住一间屋子,他用笔豪放,满屋子都是墨点,被子和衣服也不收拾,整天喜欢出洋相。夫人希望他对自己的孩子也能够多关心些,赵望云说:“孩子学生是国家的,人

方济众作品

赵望云和他的三大弟子

都应当多关心,说我偏向黄胄,我就是喜欢冒尖的,谁冒尖我就喜欢谁。”

1946年夏秋之际,中学毕业升学未中的方济众,忧郁地徘徊于西安街头。他在北大街看了赵望云画展,好像一下抓住了命运的稻草,当即到文具店里买了速写本,坐在展览室里,开始一幅幅描摹起来。连续3天,方济众在这里描摹了100多幅画。

之后的一天,方济众鼓起勇气,来到粮道巷,敲开了赵望云家的门。那天是评画会的例会,大家都在观摩画作,方济众的作业也被大家评头论足了一番。散会后,方济众留下来与赵望云攀谈,方济众说,想让赵先生介绍他去上北平艺专或西湖艺专。

赵望云说:“贫寒子弟,怎么能上得起那种洋学堂?还是从生活中找出路吧。”于是,失学失业的方济众,经常去看赵望云作画,有时也帮做些家务事。后来,赵望云为他谋了一个中学老师的职务,才算安定下来。之后,方济众又住进了赵望云家,成了家庭的一员。

当时,除了老师、师母,便是3个小弟弟,加上他和做饭的老孙,家里7口人。物价飞涨,赵望云只有每天画一张画,每年办两次画展,才能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从师学画1年多的方济众,懂得了为什么画画。到了这年的冬天,他穿着赵老师送的新棉袄,翻过大雪岭,飞回老家去了。

徐庶之,是在1948年春通过青门美术社经理田亚民引荐给赵望云的。当时,徐庶之是一个无隔宿之粮的流浪者,赵望云收他为弟子,负担了他的食宿和学习费用。

徐庶之发现老师作画时,不是一次画

完,先用水调淡墨打稿,进行流水线作业,把第一张画完第一遍,就去画第二张,然后是第三张,循环往复。当时,老师一次最少要画三幅画,一张画画四五遍,直到满意为止。而每一幅画在构图上是不重复的,题材多得很,信手拈来。老师的点景很简单,他喜欢吸烟,不喝酒,常在画动物或人物时,用吸烟点燃后的火烟棒来构图,画完后用手弹一下。老师画画用过张大千送他的大千纸,是用丝和麻做成的,有一张方桌那么大,上下两面都是云图图案。徐庶之住在老师家学画,出外画速写,在艺术创作上打下了良好基础。

1946年底,在赵望云主持下,由大千肥皂厂经理、同乡贾若萍出资,郑伯奇创作刊词,出版了《雍华》图文杂志。《雍华》社址在菊花园对面,后移至粮道巷10号赵望云的家里。赵望云任总编辑,黄胄任编辑,每月一期,内容为描写各地人文自然情况,发表小说、散文、诗歌,刊登改造中国画论的理论文章。徐悲鸿、张大千、姚雪垠、黄苗子、丁聪等,都给予热情支持。出版十期后,由于经费困难停刊。

1948年春秋之际,应西北文化委员会会长张治中约请,赵望云与学生黄胄、徐庶之同行,第三次旅行大西北。西至青海,再游新疆,先是在兰州举办描写祁连山少数民族生活的画展,后在迪化完成西行画作数十幅,由天山学会出版。

西安刚解放,在赵望云的推荐下,他的学生黄胄、方济众、徐庶之先后参加了革命工作,之后成了知名画家。

艺联

钩沉



徐庶之作品



黄胄作品